

我国当代生态环保话语的 形态流变分析*

孟登迎

【摘要】 本文对我国生态环保界普遍使用的三种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自然科学和技术治理意义上的环保话语、生态文艺和生态哲学意义上的环保话语以及生态权益维护和公民环保责任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和分析，提出要从对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反思中去审视这些生态环保话语涉及的社会历史和生态文化问题。同时，强调要从生态哲学和伦理层面对生态环保话语、生态文明和个人生活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有机的阐释，促使生态文明教育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和生命的各个环节之中。

【关键词】 生态 环保 生态环保话语 生态文明教育

【作者简介】 孟登迎，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 X-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125 (2023) 10-0005-16

在我国当下色彩斑斓的人文思想话语谱系当中，有关生态和环保的各种话语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生态环保议题由于涉及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伦理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不同视角和多重立场，同时牵涉不同国家和各个国家内部不同阶层的生态权益诉求，一直都是一个充满观念博弈和利益冲突的“问题域”。不难发现，处在不同阶层的人有意无意都在利用各种舆论平台表达自己对生态权益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化研究’的中国化研究”（18BZW006）的阶段性成果。

的诉求,由此形成的各种关于生态环保的话语表达也一度呈现众声喧哗的状态。从公众以及大众传媒目前对生态环保话语的使用和表达情况,我们大略可以看到:尽管近16年来我国政府已经将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①但相当多的公众未必了解这一战略的形成经历的复杂而曲折的认识过程。相当多的人对于生态问题的文化复杂性尚缺乏相对完整、深入的认识,对生态文明战略的形成过程及其背后依据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缺乏相应的理解,自然对自身应该承担的环保责任也就缺乏自觉而坚定的担当。

若做进一步考察还会发现,生态环保作为一个理论和实践的双重难题,一方面涉及全球经济生产结构、可持续经济转型、农业工业化和生物科技等诸多制约中国环境问题的全球结构因素,另一方面又涉及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公民责任意识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等诸多在地化因素。这么多错综复杂的结构因素交相叠加,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环保话语;这些生态环保话语最终呈现各种忽隐忽显、多重闪烁甚至层层遮蔽的复杂外观。因此,对这些混杂的话语形态进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解读,同时结合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战略对其进行重组和整合,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界和生态文明教育界目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学术工作。

①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明确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并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全面融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当中。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和国家建设方略,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知晓。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一、三种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

回顾新中国成立 70 余年的历史，会发现有关生态环保的各类话语^①基本上都是伴随着我国在不同历史阶段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逐渐形成并丰富起来的。概括来说，在 2007 年之前，至少存在三种不同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自然科学和技术治理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生态文艺和生态哲学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以及生态权益维护和公民环保责任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当然这种区分是相对的，主要着眼于它们最初形成和传播的时间顺序，同时也顾及它们在内涵指向上出现过的一些流变和偏移。到了最近十几年，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日益被强调，这些生态环保话语的内涵指向实际上已经日益呈现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态势。

（一）自然科学和技术治理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

这套最初围绕“环境保护”工作建构起来的环保话语，主要是在应对工业生产和资源开发造成的污染问题时产生的。因此，它基本上是在自然科学和科技治理的层面讨论环境污染问题，还未能自觉扩展到生态学和哲学的层面。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就高度重视工业污染问题。本着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强调要对工业污染产生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尽力进行减毒处理或废物利用。据我国首任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曲格平统计，周恩来仅在 1970—1974 年对环境保护工作就有过 31 次讲话，1972 年还支持并选派代表团参加了第一届世界环境大会。^②在周恩来的直接推动下，国务院于 1973 年 8 月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出台了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③

1973 年，北京市委决定创办《环境保护》杂志，由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份专业性环保杂志。其创刊号声明

① 此处所用“话语”概念主要采用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强调的话语构型（discursive formation）含义，即不仅关注某个相关主题的各种语言陈述，而且关注那些潜在地决定着人们如何思维、如何言说的特定文化条件和陈述范式。参见 [法]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三联书店 2021 年版，第 23~92 页。

② 参见曲格平：《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周恩来》，《党的文献》2000 年第 2 期，第 85~86 页。

③ 参见杨文利：《周恩来与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起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 年第 3 期，第 24~25 页。

要将此刊办成“学术宣传，科技探讨的阵地”。^①从早期发表的文章来看，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发动工人群众和科研人员一起搞“三废”处理和水源保护等实际工作来展开的。杂志着力介绍各种生化和环保常识，以及各地群众和科研人员的环保实验和工艺革新。该刊自1982年起由内部双月刊改为公开发行的月刊，影响面日益扩大。由于其读者对象“主要是环境管理部门的管理干部和厂矿企业的环保科技工作者”，^②故而刊发的多是从自然科学和技术改造方面进行环境保护的专业性文章，间或刊发少量有关环保政策、法规或相关经济战略的文章。从1990年代起，探讨环保政策法规、环保管理机制、环境与人、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文章有所增多。另外，国家环境保护局于1984年还创办了报道内容更为丰富和及时的《中国环境报》。

与之相应，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一批科技环保类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也纷纷建立和创办起来。中国科学院环境化学研究所于1976年创办《环境科学动态》，^③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和苏联的环保技术和实践。湖北、贵州、吉林和上海等省市的环境科学研究机构也分别创办了《环境科学与技术》（1978年）、《环保科技》（1979年）、《环境管理》（1982年，现《吉林环境》）和《上海环境科学》（1982年）等自然科学类刊物。在此期间，我国还颁布了第一部环保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成立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1979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1982—1984年）——后者即国家环境保护局（1984—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8—2008年）、环境保护部（2008—2018年）和生态环境部（2018年至今）的前身。

不难看出，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府和科技界对生态环保问题的认识已有不少扩展，开始注意环保与生态系统、城市园林系统、生态学以及农村环保等问题，并且持续介绍欧美发达国家和苏联的环保经验，有些译介外国哲学的刊物也开始介绍生态学。但总体来说，政府官员和环保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是把环境保护当作相对客观的自然科学问题而不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来看待的。事实上，将环境保护视为科技治污问题的话语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占据主导位置，甚至到现

① 《环境保护》编辑部：“前言”，《环境保护》1973年第1期，第2页。

② 《环境保护》编辑部：《回顾与展望——庆祝〈环境保护〉杂志创刊20周年》，《环境保护》1993年第8期，第5页。

③ 《环境科学动态》初为内部刊物，曾以月刊、双月刊、季刊甚至不定期方式出版，2006年改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并稳定为双月刊。从该刊改名和发行情况也能看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生态环保问题认识的深化和扩展：不再将其仅仅视为自然科学和技术治理问题，而是视为事关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还左右着一些科技进步主义信奉者和治理者的思维惯性。这套生态环保话语的表述由于基本不关注生态问题与社会生产方式及公众日常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性，故而对普通公众的环境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实际影响相当有限。

（二）生态文艺和生态哲学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

随着学术界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加之中国快速展开的经济现代化建设加剧了生态危机，在思想文化界逐渐出现了从哲学和文艺层面揭示和反思现代环境问题的努力。

早在1983年，人文学者赵鑫珊在论及文学艺术应该有生态学观照时就指出：“只有当人与自然处在和平共生状态时，人类的持久幸福才有可能。没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会是完善的。”^①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大陆人文学者最早使用“生态文明”一词的个案。四年之后，作家徐刚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作品《伐木者，醒来！》，^②此作曾被誉为“中国首部生态文学作品”。作品开篇就直接援引了以“罗马俱乐部”的倡议为代表的西方当代绿色生态思想，整部作品揭露的是我国各地的森林因当地民众贪图眼前利益、基层官员执法不严甚至纵容而惨遭乱砍滥伐的严峻现状。作者对乱砍滥伐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国人在生态意识方面的无知和麻木，充满了忧愤。当时还有几位作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报告文学作品，此类作品的批判性和时效性很强，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不过当时都未能对日常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哲学反思。

1986年冬，著名诗人海子推荐他的好友苇岸阅读美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年）的经典著作《瓦尔登湖》，这直接促成了苇岸的生态散文写作。^③苇岸随后创作出的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以平静的笔触描写各种自然风物、气候节令、动植物生存和农人劳作，直抵当代人道德和灵魂的幽微之处。1989年，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苇岸在回忆海子的文章中确证并强化了自己对梭罗自然生态思想的崇拜，这使得《瓦尔登湖》和梭罗的生态思想和简朴生活态度为更多的文艺青年所知晓。梭罗以其特立独行的笔调和行为表达自己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主流生活方式和工作伦理的嘲讽和拒绝。其作品体现的那种对于本真自由的执着追求，正好契合了在当时中国逐渐兴起的、颇受一部分文艺青年

① 赵鑫珊：《生态学与文学艺术》，《读书》1983年第4期，第110页。

② 参见徐刚：《伐木者，醒来！》，《新观察》1988年第2期。

③ 参见苇岸：《我与梭罗》，苇岸著，冯秋子编：《大地上的事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221页。

推崇的那种远离尘嚣、追求内心完善的美学趣味。当然，梭罗作品也触及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主流工作方式和消费方式对个体选择的无形压迫，但这一点似乎还难以被当时正在努力追赶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和自由消费的多数中国青年读者感知。需要补充的是，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和批评家在1980年代就开始涉猎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文学批评。据鲁枢元统计，这一时期各类刊物上至少发表过8篇与生态观念有关的文学研究和批评论文。^①但总体来看，这些零散的、感发式的生态文艺学主张和阐发，在当时并未引发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讨论。

进入1990年代之后，人文学术界、文学界和艺术界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受各种现代性批判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的启发，愈发自觉地揭示生态环境的严峻现状及其带来的深层精神危机。文学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这些表达，逐渐催生了一种从生态文学（文艺）和生态哲学（美学）层面不断展开的新型生态环保话语，从而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来参与环境问题和生态文化的讨论。

1992年，得到国家环境保护局大力支持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正式成立，包含环境文学研究会和《绿叶》杂志社两个部门。环境文学研究会于1991年1月成立（得益于《中国环境报》文学副刊“绿地”六年来的积累），以宣传环境保护为宗旨，最初由著名作家王蒙、冰心、黄宗英和文艺批评家冯牧等人发起创建；《绿叶》是该研究会于1992年1月创办的我国第一份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份环境文学刊物。据当事人高桦回忆，当年积极参加环境文学研究会和环境文化促进会的知名作家就有300多位，给《绿叶》题词的老作家和国家领导人也有20多位。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与中国作协合作，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在山东威海和新加坡举行了两届“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还组织过数次作家赴各地的采风活动，搞过环境文学评奖，编辑发行过多卷本的环境文学丛书。这些工作对宣传环保和推动全民的生态启蒙，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②

总体来看，自1990年代初开始，从各种官方的、半官方的文化社团到自由作家、学者和民间公益机构，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开始积极探索生态文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文明等问题。目前可查到的最早以“生态文明”为论题的学术论

① 参见鲁枢元：《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2页。

② 参见高桦、李景平：《从环境文学到生态文学》，《绿叶》2020年第11期，第6~14页；高桦：《难忘的一次盛会——“人与大自然环境文学研讨会”散记》，《绿叶》1996年第3期，第12~15页。

文和著作，大致发表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① 这些研究开始从生态农业、政治经济学和生态哲学等角度来探讨生态文明问题。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之前，专门探讨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还相当少。^② 不过，由于人文和社科领域一些著名的学者开始介入生态文明和生态问题的讨论，从人文和社会治理角度探讨生态环保的思想言论空间，在1990年代得到了较大拓展。比如，著名学者季羨林主编的《东方》杂志（综合性人文双月刊，1993年11月创刊，1996年底停刊，共出版19期）在1995年第2期和1996年第3期就曾开辟“环境与发展”专题，发表过多篇从大气治理、土壤改良、经济发展、技术哲学、生态伦理、文物遗存等多学科角度探讨生态保护问题的高质量文章。这些文章得益于《东方》杂志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对当时的学术界、思想界和普通读者群体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季羨林本人当时对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命题的一些新的解释，也不断强调“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③ 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曾繁仁等学者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去创建“生态美学”的设想和学术实践。^④

文学界和美学界首次以“生态美学”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于2001年10月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⑤ 需要注意的是，生态文学观和生态美学的话语构

① 我国生态农业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叶谦吉（1909—2017年）早在1984年在苏联讲学时就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并于1986年从生态需要、生态农业和生态经济等角度较为完整地论述了“生态文明”的理念。参见叶谦吉：《生态需要与生态文明建设》，郭书田主编：《中国生态农业》，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81~85页。另，我国经济学家刘思华在1987年前后就结合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观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观念。参见《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正确认识和积极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深研究员刘思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第13~14页。还可参见卢凤：《“生态文明”概念的来源》，卢凤等著：《生态文明新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② 笔者于2022年11月22日检索“国家图书馆”网站书目系统，发现标题涉及“生态文明”的专著和普及读物，从1992至2006年这14年间总共只有21部，而自2007年（尤其是2013年）后显现井喷式增长。目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和教材有1700多部，如果将学位论文和其他形式的成果包含在内，则有2600多种。另外，在“知网”进行篇名检索，相关论文多达4.4万篇；进行主题检索，相关文章超过了13万篇。

③ 参见季羨林：《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读〈丝绸之路〉札记》，季羨林、张光璠编选：《东西文化议论集》上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原话是：“天，我认为指的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人类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否则人类前途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甚至存在不下去。在天人的问题上，西方与东方迥乎不同。西方视大自然为敌人，要‘征服自然’。东方则视大自然为亲属朋友，人要与自然‘合一’。后者的思想基础显然就是综合的思维模式。”

④ 参见鲁枢元：《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2页。

⑤ 参见吴承笃、徐瑾琪、叶莎莎：《首届全国生态美学研讨会综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55页。

成相当复杂，有从西方现代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当中汲取的，也有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借鉴的，还有对占支配地位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话语及其引导下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产生的自觉拒绝和批判，以及对当时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现实危机的担忧。但总体来看，此类话语中的大多数相关表述还处在观念认知层面，甚至有些还崇尚非历史化的、古典的“天人合一”梦想，弥漫着一些远离尘嚣式的浪漫表达或自我避世的自由幻景。的确，这类生态话语具有生态启蒙和生态哲学反思的先驱意义，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但是一般都相对忽视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现实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方式、普通民众的民生境遇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复杂关联，容易流于浪漫化的美学想象或观念批判。

（三）生态权益维护和公民环保责任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

与科技界和人文界日益扩展、丰富以至于高涨的各种生态环保话语相应，我国政府自1989年起开始向社会公开发布年度《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7年起更名为《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①并陆续出台和修改了一系列加强环境保护和推动环境教育发展的法律法规。^②这些务实的工作为广大

① 在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即可查询1989—2020年每年度的《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s://www.mee.gov.cn/hjzl/sthjzk/>，2022年3月2日。

② 中国法学会2010年6月23日发布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09）》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已经制定了30多部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诸如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等。参见《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2009）》，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0-06/23/content_1578008.htm，2022年3月2日。仅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来看，就制定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通过，1997年3月1日起施行）以及《城市绿化条例》（1992年6月22日通过，1992年8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1993年8月1日起施行）、《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年8月4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3年10月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年12月1日起施行）等法律法规。以上信息均检索自“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网站，<https://www.pkulaw.com>，2022年3月2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法治污的力度日益强化，制定和修改了更多更严格的环保法规，比如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7月18日发布的《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宣布了自2021年起全面停止进口“洋垃圾”的禁令。另外，我国教育部门自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通过官方文件（教学计划草案及其调整意见）倡导和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环境教育和生态文明教育。1996年12月10日由国家环境保护局、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2010）》，开始将全国民众纳入环境教育的受众范围。到2011年4月22日颁布《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2011—2015）》时，联动部门又增加到6个（环境保护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民众参与环保监督和治理提供了现实条件，也为推进环保工作和环境教育提供了法制和体制保障。与官方开展的这些日益开放透明的信息公开和立法工作相呼应，各类环保民间组织也纷纷成立。截至 2005 年底，我国共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 2768 家，其中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占 49.9%，民间自发组成的占 7.3%，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 40.3%，国际环保组织驻华机构占 2.5%。^① 2005 年后，环保民间组织每年更是以 10% ~ 15% 的速度递增，到 2008 年 10 月各类环保民间组织已增至 3539 个（包括港澳台地区）。^② 到 2012 年底，我国环保民间组织更是达到近 8000 个。^③

中国最早的环保民间组织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如 1978 年 5 月成立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民间自发成立的环保组织于 1990 年代初开始出现，如 1991 年辽宁省盘锦市成立的黑嘴鸥保护协会、1994 年著名学者梁从诫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的“自然之友”、1995 年哲学学者廖晓义发起成立的“北京地球村”等。民众自发成立的各种环保民间组织主要面向普通市民（村民）开展富有针对性的环境教育和生态权益维护活动，一方面协助和监督政府部门的环保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公民环保意识的培养和提升。它们使更多的普通人对环保有了切实的危机感和权利维护意识，提升了公民参与环保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环保民间组织在 21 世纪初的日益勃兴，也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环保维权话语，并逐渐在公众舆论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开始出现一些从公民权利方面来维护生态权益的声音，甚至将公民参与生态环保监督作为建构市民社会的一种实践方式。

市民阶层的维权型环保话语逐渐成为在公共舆论平台谈论环保问题的主要内容，这不仅推进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也推动了某些环保立法的改善。尤其是 2015 年开始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进一步保障了公众要求公开环保信息和参与环保监督的权利。例如，截至 2021 年底，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总共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就达 51 起，其中 44 起获得立案（包括大气污染案件 15 起，水污染案件 4 起，应对气候变化案件 2 起，土壤污染案件 8 起，海洋污染案件 1 起，生物

① 参见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环境保护》2006 年第 10 期，第 61 页。

② 参见谢小亮：《环保民间组织将以 10% ~ 15% 速度递增》，《大众科技报》2006 年 6 月 29 日，转引自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环境保护》2006 年第 10 期，第 68 页；崔静：《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迅速总量已达 3500 余家》，http://www.gov.cn/jrzq/2008-10/30/content_1136350.htm，2022 年 3 月 2 日。

③ 参见刘毅：《我国环保民间组织近八千个五年增近四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12 月 5 日。

多样性保护案件12起,行政诉讼案件2起),已结案25起,尚在审理中的案件19起。^①尤其是该机构联手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于2011年对云南一家污染企业提起的公益诉讼,曾经引发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的高度关注,尽管直到2020年才结案,但这是我国第一例由民间环保公益组织依法发起并取得最终胜诉和成效的公益诉讼。^②环保民间组织动员民众广泛参与,以公益诉讼方式起诉不法企业,这对推动全民参与环保监督和治理无疑将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

随着民间环保行动的深入开展,更多的作家、知识分子和志愿者开始介入公益性的环保事业当中,努力将生态环境问题与文学、文化、公民环保素养培育甚至农村弱势群体的生态权益保护等问题结合起来。比如,2004年前后中央电视台和其他中央媒体对淮河流域因遭受水源污染而出现的“癌症村”惨剧以及内蒙古等地因生态恶化被迫迁徙的“生态难民”等的报道,就促成了国家环保政策的重大改进,也激发起更多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这表明,维权型生态环保话语冲破了科技治理型生态环保话语的局限,丰富并深化了有关生态和环保问题的讨论。

二、从全球发展模式审视生态环保话语的内在张力

以上所述三种意义上的生态环保话语,都从各自角度为推动公众的生态环保认知和环保意识完善提供了可取的思想资源 and 实践路径。当然,它们在思维层面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基本上都未能注意到或重视这一点:生态环保还关系到全球商品生产流通、国际政经关系乃至数百年全球殖民史孕育的经济发展结构和发展模式,甚至有时会升级为文化政治战略问题。

实际上,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一些受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哲学批判精神影响的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结构,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人文学者汪晖在担任《读书》杂志的主编时,就刊发过一些相关的文章,他还与香港学者共同选编了《发展的幻象》(2001年)等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的著作。《天涯》杂志2001年第1期发表了一篇名为《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的文章,该文是1999年在海南三亚“南山生态文化苑”召开的一个名为“生态与文学”的学术研讨

① 参见“自然之友”网站“环境公益诉讼”条目, <http://www.fon.org.cn/action/way/2>, 2022年11月20日。

② 参见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曲中法民初字第110号公告。

会的纪要。与汪晖有密切思想交流的黄平、李陀、陈燕谷、王晓明、戴锦华等人文学者都参加了这次专门讨论生态问题的学术会议，他们基本都认为应将中国的生态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发展主义幻象的层面来加以批判性分析。汪晖于2008年发表的访谈性文稿《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进一步明确提出，环保将成为21世纪的重大战略问题。他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模式问题”，只有对发展主义、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做出深刻反思，才能真正厘清中国生态问题的深层结构性根源，为我国寻找出一条可以均衡各方压力、可持续发展的突围之路。^①

的确，如果我们回顾400多年来全球经济的发展史、欧美列强对亚非拉各国的殖民史和工业革命的扩张史，并且从这些历史的视角来观察当今世界范围的生态问题，就会获得一个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②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产格局中充当的初级原料开采者（提供者）、工业机械和日常生活用品制造者（提供者）、发达国家生活垃圾接收者（购买者）等被动角色，与发达国家普遍扮演的科技创新者、金融霸权者和高耗能奢侈品消费者等主导性角色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生/依附关系。换句话说，全球性的经济生产（增长）方式与全球性的生态恶化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全球化生产和消费的供应链、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全球的强势流动把现实的生态危害和生态压力相对便捷地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民众身上。因此，全球性的南北差距、经济生产分工、资本逐利流动和利润获取上的巨大差异，使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生态危机变得更为严峻和复杂化。

为此，自20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污染物排放问题进行了各种谈判和合作，好不容易签订了多项相互约束或扶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生产和治污技术的议定书或协约。但是，这些议定书或协约首先在某些发达国家就未能得到真正的执行和遵守（尤其是世界上最发达且人均和总体耗能和排碳量均居于全球前列的美国，常常会因国内党派政治和民粹化的利益倾斜而时不时地否认或退出全球气候协定），另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由于经济生产方式落后、环保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执法不到位或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难以保障，也往往难以得到完全的贯彻。

^① 参见汪晖：《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绿叶》2008年第2期，第6页。

^② 英国历史学学者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持有类似的观点。参见[英]克莱夫·庞廷：《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90年代以来联合国各成员国就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做的努力,可谓一波三折。其间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还存在相当多的缺憾。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提出各国需遵循“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体现“气候正义”的基本原则。但当时关于气候正义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围绕“责任分配”和“责任落实”展开,未能直面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该公约在随后的落实过程中就出现了很多争议和拖延,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屡屡受挫。1997年签订并于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延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宗旨,有192个国家缔结;但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却只有66个国家接受,远低于其正式生效要求的144个国家的数量。尤其是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没有在国内批准《京都议定书》,加拿大也于2012年宣布退出。日本和俄罗斯也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面对《京都议定书》的严重分歧,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只通过了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如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援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但至今并未充分兑现)。2015年12月联合国通过的《巴黎协定》似乎又有了达成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新希望。其第4条第2款提出了各个国家自主决定、规划和定期报告的系统模式,虽然形成了自下而上、自主调整、极具灵活性和弹性的机制,但同时弱化了对各国政府的法律约束力。尤其是特朗普上台执政以后,美国于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尽管联合国和包括美国传统盟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纷纷予以谴责,也无济于事,这使得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再度受挫。^①值得庆幸的是,欧盟主要国家还继续与中国、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大国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实施。在2021年11月初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6次会议上,中印两国做出了正式承诺,分别力争在2060年和207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由于全球生态环保事业饱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要弥合各国分歧、扩大共识、促进环保事业发展,还有很大的挑战。

与这种国际生态不公和环保争议相伴随,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阶层对生态权益诉求也有不少的差异甚至冲突。著名记者和主持人柴静2015年制作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上》,以切身经历揭示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及对民众健康的巨大威胁,并对中国环境污染问题表现出极度忧虑。该片在短短几天内引发数亿人观看和共鸣。但需要指出的是,柴静对

^① 参见张肖阳:《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90页。

空气污染问题的观察视角和解决思路却是相当可疑的。她及她代表的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往往只看到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蓝天绿树、空气清新的后现代休闲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多是各种重工业和日用品制造业的污染，但她忘记了正是发展中国家在为发达国家的高消费承担破坏本国生态环境的代价，正是大量劳工阶层在劳作过程当中自身承受最严重的污染损害。有些人很容易简单挪用所谓的国际“主流”生态权利话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批驳和指责，甚至忽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基本生存权，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切实际地减少碳排放，甚至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决方案。^①

这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在困难群体的生存与整个社会的生态保护之间，在不同阶层对生态权益的诉求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复杂的差异和内在困境。因此，生态环保话语绝不是可以轻松自圆其说的一套说辞，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某种文化政治，还需要顾及全球经济生产方式和各国社会阶层的多重结构。

三、生态环保话语的立论基础与日常生活伦理指向

如上所述，生态环保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全球扩散以来形成的世界经济生产结构和发展主义模式，而与此过程相伴而生的各种生态环保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可看作人们针对这种全球不均衡生产结构导致的生态危机现状的思想反应。这些思想反应和话语，或者出于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治理的信奉和依赖，或者出于对生态现状的哲学忧思和美学批判，或者出于对环境正义和生态权益的维护和争议，但最终都与人们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类生产等问题的哲学观有深层的关联。因此，要想对这些话语做出更深入的分析，除了重视它们依托的全球经济生产结构、发展模式、国际关系和国家社会结构，还应该从哲学和伦理学层面对其进行更有效的反思。

概括地说，无论是那种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功利自然观（仅仅将自然当作攫取利润的生产资料），还是梭罗代表的那种远离主流经济社会、以个人身份回归自然和荒野的超验主义自然观，抑或是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

^① 可参考丁仲礼院士在2010年3月21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相关阐述，该访谈名称为《丁仲礼：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视频见央视网，http://tv.cctv.com/2010/03/31/VIDEdu5EUoJiNv6LWsou3Yz100331.shtml?srcfrom=baidualading&event2=bdtg_pc_hkafjzpq，文字版见，<http://news.cntv.cn/program/mianduimian/20100510/105441.shtml>，2022年3月2日。

“后自然”或自然终结说，似乎都还没有超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与自然的动态实践关系所做的论述。马克思所说的主客体在劳动当中结成的相互改造的关系，以物质生产及其衍生的生产方式为基石，打开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社会）、人与自我的各种现代紧张关系。人对自然的肆意开掘、操纵及利用，导致自然生态严重失衡，后者反过来报复人类；人对他人的阶级剥削和控制关系导致人性的沦丧和彼此对抗；而人与自我的内在紧张导致个体孤独、怀疑和远离尘嚣的各种逃避冲动，并激发各种个人传奇和自然书写（或荒野文学）的诞生。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年）笔下的鲁滨孙对自然资源甚至有色人种的直接占用、利用和剥夺，就是一种强悍的、功利的、粗暴的占有性个人主义，而梭罗对个体心灵和精神自由的极端捍卫，则是一种清高的远离尘嚣的个人主义。梭罗的确很敬畏自然，但那自然似乎是他眼中可以释放灵魂紧张感的自然，而不是人类与之经过相互改造之后趋于和谐的那种人与自然的丰富关系。在我国学术界，那些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美学话语和生态文艺批评，很多也是把人（尤其是人类）抽象地看作与自然相区隔甚至对立的存在，往往只简单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不太重视与这种关系密切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未能将社群、人际和谐与互助等社会历史维度纳入对生态话语的核心考察。

马克思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①这说明现有的一切物质性的劳动成果（甚至包括非物质的文化制度和文艺）都是人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历史延伸，甚至人类自身也是通过这种实践过程把自己从自然存在物改造成了社会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实践中主体（人）的内心结构得到了知、情、意的扩张和调节，从而产生了“双重自然人化”，这使自然和人都得到了相应的改造并结成了互相关联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应该是在经历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磨合甚至对抗之后最终达到的更高层次的和谐共生状态。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其中必然存在和包含各种历史的和政治的复杂维度和丰富内涵。因此，任何只强调技术主义的、有意无意“去政治化”的环保话语，必定都难以面对真正的、现实的生态问题和生态教育实践。^②在大自然已被全面商品化、资本化和过度景观化开发的当代，在私人占有和品位区隔已经成为普遍生存形态的社会环境中，还有没有可能依然存在（或即将形成）某种可以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② 参见夏永红：《生态文明：一种自治主义进路？》，倪伟、郭春林编：《热风学术》第1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71~77页。

彰显人们共享自然、友爱同类的新型生态关系？这种新型的生态关系需要人们在生产、消费、利益分配和教育方面做出哪些制度性的改良？作为消费者的个体，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何参与那些旨在推进生态环保的新型日常生活政治？我们能否不再只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对自然应该尽量少取多予，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出发，还可以从人（个体）与他人的角度来促成一个低耗能的友爱社会？每个人是不是应该从仅仅专注于自家的小花园、房子、车子、旅游和宠物的迷恋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去关注依然在遭受战乱、剥削、暴力、饥饿和病灾折磨但被主流话语漠视甚至遮蔽的大量的弱势群体，以及无告的大自然和动植物？我们除了关注自然和弱势群体，是不是还应该身体力行地推进自我的“心灵环保”，如参与劳作、精简饮食、朴素生活、佛禅静修？^①

进而言之，我们对现有生态环保话语的批判性反思，最终应该落实到日常生态实践当中，落实到每个人在生产（生计或生存）、生活和生命当中所处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意义层面上，同时应该努力把这些实践和意义协调统合起来。目前从事生态教育探索的一些公益人士，已经开始尝试将生态教育与自然教育、劳动教育、市民消费观念引导、农耕劳作体验等活动相结合，同时也在努力与我国政府提出的那些有助于城乡互助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如乡村振兴战略、生态文明战略和经济“双循环”战略）进行对接。这些实践和努力，若能坚持和推广，相信定会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生态环保的多元思考，也许不但有助于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经济，还可能促使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思考：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农业、工业、服务业，需要什么样的自然和生态，才能安放好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群和动植物生灵的精神所在？在目前这个依然还有大量饥饿和贫困人口存在、生态危机四伏的世界上，我们如何才能让那些弱势的边缘人群释放更多的能量和活力，获得更多的尊严和幸福？所有的这些疑问和期待，似乎都很自然地指向了生态环保话语对应的各种日常生活伦理实践。

四、结语

本文对生态环保话语生成史、生成机制、立论基础和日常生活伦理指向

^① 参见《台湾佛教探秘之旅第三集：心灵环保》（2013年7月19日），搜狐视频网，<https://tv.sohu.com/v/cGwvNTY5Mjk3Ni81OTlxNjUxMS5zaHRtbA==.html>，2022年3月2日；“法鼓山全球资讯网”相关文字介绍，<https://www.ddm.org.tw/xchome?xsmsid=0K333816916533380810>，2022年3月2日；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网站相关链接中对证严法师慈济理念和行动的介绍，<http://www.tzuchi.org.cn/>，2022年3月2日。

的讨论，大致勾勒了我国当代相对驳杂的生态环保话语呈现的基本样态和内在张力。这些生态环保话语当中显然交织着各种（反）西方霸权、反思发展主义、公众抗议、绿色政治、生态哲学（伦理学）及生态美学等方面的思想因素，而且这些思想因素一直处在一种相互交叉、相互协商和彼此消长的态势当中。相信这些讨论依然还有可以持续展开的空间，比如，在西方环保话语霸权与发展中国家的迫切发展诉求之间，在左翼知识界对发展主义的激烈批判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复杂处境之间，在生态哲学（伦理学）的普遍学理与个人的生态观念和生态伦理选择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复杂接合（articulation）和博弈？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希望更多的学界同道与笔者一起来深化和推进。

笔者之所以不揣浅陋来探讨生态环保话语的生成和流变——一个充满挑战的跨学科论题，当然不想仅仅停留在话语分析的层面；我们更重要的工作，是通过对这些生态话语和生态观念的讨论，进一步正视和改进我国生态教育实践目前依然存在的诸多缺陷。凡是真心关注和从事生态教育的人们（包括有深入思考的环保志愿者）不难发现，我国目前的生态教育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在政府对生态文明的大力倡导与普通民众相对缓慢的接受之间，还存在较大的距离；在学校生态环保教育、公共传媒生态环保宣传与公民生态环保教育（包括家庭生态环保教育）之间，在人们的环保认知与亲身践行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生态教育涉及生态学、历史学、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和美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农学和医疗保健学等多个相关学科，也对从事生态教育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既要具备比较渊博且扎实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还要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些已经对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期待更多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同仁来共同探讨。

（责任编辑：李 涛）